

● 翻译研究

文化翻译学元理论探析^{* 1}

杨仕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摘要: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离不开该学科的理论。元理论是学科的自我反思, 是对学科的论证、审视与总体描述。本文提出文化翻译学元理论的结构体系, 认为文化翻译学元理论包含文化翻译学的定义、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问题, 并对每个问题进行探讨, 从而初步建立文化翻译学元理论。

关键词: 文化翻译学; 元理论; 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2-0079-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2.013

On the Metatheory of Cultranslatology

Yang Shi-zh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it is insufficient without a metatheory of the discipline. Metatheory is a self-refle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t demonstrates and describes the discipline as a who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etatheoretical system of cultranslatology, which consists of definition of cultranslatology, its theoretical basis, discipline nature, research object and task, research methods, discipline system, etc. All of these issues a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so as to advance metatheory of cul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ultranslatology; metathe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1 引言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是该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自身一些问题所进行的自觉思考。“一门学问的元理论或元学问是这门学问的自身反思、自我认识, 它主要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科特征与判别标准(包括这门学问作为一门学问必须具备的条件、必须满足的要求), 它所特有的目标、任务、问题、方法, 它的根据与确证, 它的体系框架, 它的功能、功用, 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学问的划界、关系”(刘永富 2002: 1)。文化翻译学元理论是对文化翻译学这一学科的论证、审视与总体描述, 主要探讨文化翻译学的定义、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问题。

2 文化翻译学的定义

科学界定文化翻译学概念是文化翻译学的基础。文化翻译学与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并不相同。西方文化学派研究文化中的广义翻译过程问题, 属于翻译学外部研究, 有些研究甚至就是文化研究; 而文化翻译学基于翻译本体, 研究狭义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问题, 属于翻译学内部研究, 是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

文化翻译学由于基于翻译本体, 所以自然不会脱离语言/文本的转换。文化翻译学主要研究狭义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素的翻译转换, 即翻译中的文化移植活动。这一研究与翻译学本身研究一样, 内容非常复杂, 仅仅依靠某一个学科无法完成, 必须运用众多学科理论与方法, 文化翻译学因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概言之, 文化翻译学可以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翻译学的学科建构研究”(13BY023)的阶段性成果。

被定义为系统研究作为文化移植活动的翻译的综合性翻译学学科。

3 文化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层面上看,文化翻译学乃至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是价值哲学。“价值问题,简单说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世界万物、人和社会、人的思想和活动等在内)对于人的意义(好坏、善恶、美丑、利弊、祸福等)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的反映和选择等问题”(李德顺 2002: ii)。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活动,它的最终目标是价值实现问题。只要进行翻译活动,就必然为了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源语文本的交换价值(精神价值)或者比较价值。对源语进行的各种转换以及对源语文本实施的各种操控,其驱动力从根本上讲都是源语文本的价值。

从具体学科层面上看,文化翻译学的理论基础除翻译学外,还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化属性的各种学说,涉及文化学、普通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由于翻译是通过转换源语来再现源语文本的活动,而语言与文化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转换源语过程中必然要解决源语所蕴含、所表达的各种文化信息的问题。

一种语言所反映、所表达的文化能不能被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呢?对于同一个民族来说,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表达与被表达关系是浑然天成、互动发展的。有学者认为,民族语言在承载文化时兼有天然性与人工性。“语言承载文化时可能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承载本民族文化,它完全胜任;另一种是承载异民族文化,它不完全胜任。我们可以把完全胜任的语言称为天然载体,把不完全胜任的语言称为人工载体。翻译就是通过语言的转换来改变文化载体,变自然载体(母语载体)为人工载体(译语言载体)。这里面自然包含对译语言不能胜任的许多情况的处理问题。”(周志培 陈运香 2013: 82) 这样看来,源语承载的文化难以用译语表达出来。进一步而言,问题不仅仅在于译语能不能表达源语承载的文化,还在于译语表达的源语文化能不能在译语文化中得到对应的理解与接受。这正是翻译的困难所在。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难题并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翻译活动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关学科也为这一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与扎实的理论基础。

4 文化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同翻译学本身一样,文化翻译学不是一门交

叉学科(边缘学科),而是综合学科。综合性作为文化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之一是相对于单一性、交叉性(边缘性)而言的。文化翻译学不仅具有综合性,还具有其他一些性质。

从描写性与规定性这对范畴看,文化翻译学主要是描写性的。“任何一门经验科学如果缺少一个恰当的描写性分支学科就不能宣称完备而(相对)独立”(Toury 2001: 1)。“翻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建基于翻译经验(translation experience)”(刘宓庆 2005: 15)。虽然图里(G. Toury)所言指向他的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翻译学外部研究,而刘宓庆所说的翻译学是本体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是翻译学内部研究,但是图里所言同样适用于翻译学内部研究。

文化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同样以描写性为主。文化翻译学须要描写文化翻译过程与文化翻译现象,描写的内容是实际存在的情形。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不同的文化语境可根据自身的翻译规约性规范(конвенциональная норма)确立一些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与方法。也就是说,文化翻译学也具有规定性的特点,只是规定性处于次要地位。

从描写性与阐释性这对范畴看,文化翻译学在着力进行描写的同时,也对各种文化翻译现象进行阐释。“翻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描绘,更重要的是解释,因为解释是任何学科发展的最高目标之一”(赵彦春 2005: 101)。切斯特曼(A. Chesterman)认为翻译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已经是由哲学概念分析(philosophical conceptual analysis)转向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他提出的实证翻译理论的3个主要目标之一便是解释性研究,“解释译者行为的原因,提出可检验的因果规律”(Chesterman 1998: 201, 228)。文化翻译学须要揭示不同文化译法的理据性,解释文化翻译中各种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等。文化翻译学是描写与阐释的结合。

可见,文化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兼有描写性与阐释性,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还有可能形成某种规定性。

5 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要明确它的研究对象(吕红周 单红 2016)在讨论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区分研究的客体(объект)与对象(предмет)这两个概念。“客体是引出问题情

境并被选来研究的过程或现象。对象是客体范围内的东西。研究的客体与对象作为科研过程的两个范畴,彼此之间是总体与局部的关系。客体中的某一部分可以被分立出来用作研究对象。”(Кузин 2008: 11) 早有学者指出,“翻译是各种不同科学研究的客体”(Швейцер 1973: 6-16)。“翻译作为言语活动的特殊形式,是一种复杂的多面现象,该现象的各个不同方面吸引了文艺学家、心理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Швейцер 1973: 6)。

翻译学当然要研究翻译,但是“翻译”作为客体,也可以被其他学科加以研究。俄罗斯学者加尔博夫斯基(Н. К. Гарбовский)曾指出,同一个客体“翻译”可以被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法学、医学、文艺学和艺术理论等不同学科研究(Гарбовский 2004: 214),尽管这些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并且互不相同。的确,语言学家也会以翻译为客体,利用翻译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学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往往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描述翻译现象。他们研究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便利语言研究”(张柏然 辛红娟 2005)。甚至哲学家们也谈论翻译。不过,他们同样只是把翻译当作研究的客体,借以说明哲学问题。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讨论翻译问题实际上是出于各自哲学理论的需要,作为他们理论论述的佐证,并非是他们发明出来用于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如此看来,“如果从翻译视角透视文化与语言,便构成了‘文化语言翻译学’,简称‘文化翻译学’”(王秉钦 1995: 10 2007: 12)。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从翻译视角透视文化与语言,其目标是文化与语言研究,翻译成为工具,而不是被研究的对象,难以构成文化翻译学。

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对翻译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形。“对翻译的文化研究及各流派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的文化研究的许多领域虽然和翻译有某种联系,但这些领域已不是翻译的本质方面。由于翻译与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现象的紧密联系,翻译的文化研究的诸多研究是在相关学科的框架下进行的,其结论也只能是相关学科结论的验证或补充。”(张柏然 辛红娟 2005)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研究只是把翻译当作研究的客体,而不是对象。换句话说,有些学科虽然也谈论翻译问题,但它们并不是以研究翻译为己任,而只是利用翻译来说明各自的观点或理论。当然,这些学科

有关翻译的观点与理论对翻译研究不无益处,有时甚至作用很大(如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但是终究不能替代翻译学本身的研究。

区别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一些学者(吕俊 2004,赵彦春 2005: 3-9)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非本体研究的批评,有助于理解西方翻译研究在经历“文化转向”之后为什么会出现“U形回转”——“回到语言学”(Snell-Hornby 2006: 150-151)的趋势。

文化翻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研究的客体是本体意义上的翻译,离不开语言/文本的转换,因而属于翻译学内部研究。这不同于西方“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后者主要关注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广义翻译过程的制约。“所谓‘文化转向’只是将原来被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排斥在外的诸因素纳入译学研究者的视野,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成为它外部研究的组成部分。”(吕俊 侯向群 2010)

文化翻译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键在于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独立的研究任务。能否准确把握研究对象将影响学科的独立性,不可轻视。对于文化翻译学,有学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既是语言文化,又是翻译,是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它以语言文化为对象,但立足于翻译,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换言之,应当从文化的全方位,即从复杂而又处于动态多变过程中的整个文化场中考察语言翻译,发掘翻译中一切文化因素,并从翻译中反观文化”(王秉钦 1995: 7 2007: 10)。历史地来看,在文化翻译学开创之初,这一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也得到学界的肯定与接受^①。不过,这里所说的“研究对象”似乎指研究内容或范围,与我们所说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可能是语言文化,因为语言文化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范畴,也不可能是翻译,因为翻译是由文化翻译学的上位学科——翻译学来研究。而“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以及“从翻译反观文化”已经超出作为基础学科的文化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如果把它们作为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势必模糊文化翻译学的学科边界,影响文化翻译学的独立性。

文化翻译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进行的文化移植活动。翻译活动一旦发生,翻译行为在整体上便是一种文化移植活动。

也就是说,只要源语文本被翻译成译语文本,从文本层面上看,必然是一种文化移植,尽管文本内的文化细节(即各种微观文化素)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转换、变形甚至删除。俄罗斯学者加尔博夫斯基在分析翻译理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时指出“翻译理论的对象是译者创造另一事物(иное)的转换活动,尽管他的目标是创造某种类似事物(подобное)。正是这一矛盾以及引起这一矛盾的语言原因、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历史原因、民族原因和其他层面原因构成翻译理论的对象”(Гарбовский 2004: 218)。而在文化翻译学研究的文化移植过程中,“另一事物”与“类似事物”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脱离源语文化土壤的译语文本,表象上愈是接近源语文本,文化可接受程度往往会愈低,所以在实际文化移植过程中文化转换与文化变形必不可少。在译语文本中,源语文化被淡化、被中和、被替换甚至被删除在所难免。译本虽以源语文化为主,却也融入不少译语文化。在文化层面上,译者的目标虽然是移植源语文本文化素,即创造一个文化类似事物,但是实际创造出来的肯定是文化上的另一事物。

因此,进一步地来看,译者移植文化却又变动文化的矛盾以及引起这对矛盾的各种原因构成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的研究对象决定具体的研究任务。围绕文化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文化翻译学的研究任务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描写文化移植活动的过程,揭示译者移植文化却又变动文化这对矛盾本身;二是阐释文化移植活动的结果,阐明文化翻译方法的理据性,解释上述矛盾产生的各种原因。具体来说,文化翻译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含6个方面:(1)文化之于翻译的意义;(2)文化翻译单位;(3)文化翻译方法及其理据性;(4)异常翻译及其文化阐释;(5)文化翻译机制;(6)译本的文化属性。须要指出的是,这6个方面只是文化翻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任务。文化翻译学除基础理论外,还有元理论、历史研究与应用研究。

6 文化翻译学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方法?“方法的实质就是:自觉地从一定的角度、模型或框架出发把不能直接达到的总目标或最终目标化为一系列能直接达到的分目标或阶段目标……简言之,方法就是间接达到目标的途径。”(刘永富 2002: 8-9)在普通科学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翻译学需要运用横断性科学方法(系统方法)、经验性科学方法与理性科学方法。文化翻译作为翻译这个系统的子系统,其研究需要运用系统方法,以便更好地描写与阐释文化翻译。

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在1973年出版的《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中将“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贝塔朗菲 1987: 51)。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系统由若干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合体,即系统。文化翻译系统是在翻译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实施的文化移植、文化适应与文化过滤三位一体活动。

从构成要素上看,文化翻译系统包含译者、文化素、文化翻译策略、文化翻译方法与译文。从层次性上看,文化翻译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在关系上并不是平列的。很显然,译者处于系统的最高层次,文化翻译方法低于文化翻译策略。即便是文化素,也因大小不同与价值高低而存在不同的层次。文化翻译系统中的这些要素相互联系,通过结构形成整体。“结构是系统内各要素的组织形式,是要素间的关系”(杨春时等 1987: 13)。系统通过结构将要素联结起来。文化翻译系统的结构是译者在对源语文化素认知的基础上,依照文化素的类型(宏观或微观)与价值(知识价值或/和美学价值),在自己翻译观(既有纯个性的,也有受翻译规约性规范制约的)支配下,采取相应的文化翻译策略与具体的文化翻译方法,最终形成译文。文化翻译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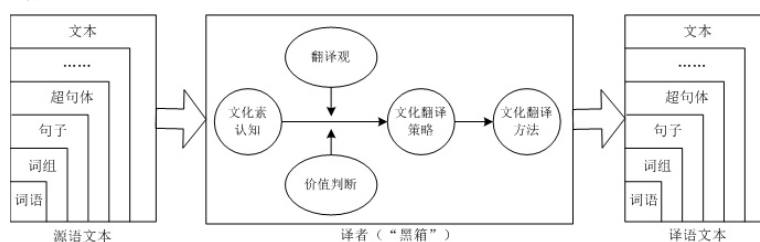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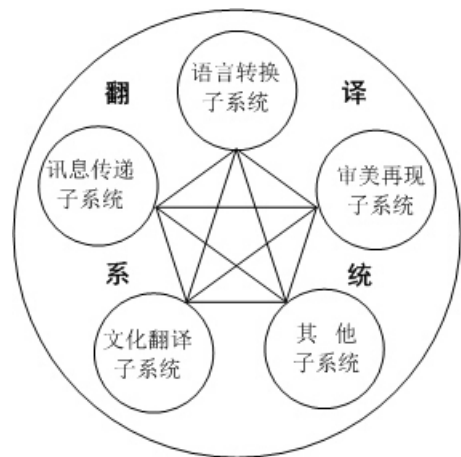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翻译系统的结构模型

研究系统不仅需要了解系统的要素与结构,还要研究系统的功能。“系统在特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或能力就叫作系统的功能”(同上:23)。系统总是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并处在更大的系统包围之中。文化翻译子系统与翻译其他子系统同处在翻译这个母系统之中。翻译系统除包含文化翻译子系统,还包含语言转换子系统、讯息传递子系统、审美再现子系统以及其他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如图₂所示。



图₂ 翻译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图₂显示,翻译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经常互为目标与手段。文化翻译离不开语言转换,也同样不可忽略讯息传递或/和审美再现。文化翻译子系统之外的其他子系统、译语文本的读者以及译语文化语境构成文化翻译子系统的环境。文化翻译子系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它在翻译母系统乃至译语文化语境中发挥的作用。文化翻译子系统的功能是基于语言转换,通过讯息传递或/和审美再现来传播异质文化,实现文化素的各种价值。

当然,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对环境的作用不是单向的,环境会通过反馈对系统的活动进行调节。“环境受到系统的作用后,会把其结果作为信息返回到系统中去,系统根据这些信息就会调节自己的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挥功能”(同上:24)。文化翻译系统乃至整个翻译母系统都是如此,它们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读者以及译语文化语境的调节,从而使自身得到不断的完善。利用系统方法不仅可以明确文化翻译系统的要素、结构、层次和功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优化文化翻译系统,通过调整系统结构,协调要素关系,使文化翻译系统能更好地服务文化翻译的既定目标。

从研究逻辑上看,由于文化翻译学是描写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的结合,因此既需要运用归纳逻辑(归纳法),也需要运用演绎逻辑(演绎法)。归纳法是通过观察获取材料,再对材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形成观点、假设乃至理论。归纳法包含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在获取材料和事实时,文化翻译学需要使用观察法、文献法、语料库方法、实验法和社会调查法等经验性科学方法;在对材料和事实进行思维加工时,文化翻译学需要运用比较法、归类法、分析法和综合法等理性科学方法。演绎法与归纳法相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某一理论提出假设,然后通过观察对假设进行验证(证实或证伪)。文化翻译学在运用演绎法时同样包含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在观察、验证阶段会使用实验法、比较法和分析法等。

在具体科学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翻译学作为翻译学的子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点,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翻译学研究方法同样可以为文化翻译学使用。科米萨罗夫指出,现代翻译学广泛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或完全借鉴,或进行必要的改动),其中包括对比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转换分析法、统计法、模式化法、问询法和实验法等(Комиссаров 1990: 37-39, 1999: 23-27)。这些方法也可以运用于文化翻译学研究。

除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外,文化翻译学还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包括文化素析出法、价值分析法和语境化方法等。文化素析出法指在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文本或话语中获得文化素的方法。只有准确识别文化素,文化翻译才成为可能。价值分析法是确定文化素的价值类型与价值层次的方法。只有对文化素进行价值综合分析(如语义价值、语用价值、语篇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才能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与相应的翻译方法。语境化方法是将文化翻译事实置于语境(文内语境和文外语境)来阐释文化翻译方法与文化翻译现象的方法。孤立地看某一文化素,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译法。但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该文化素的译法就会非常有限,甚至只能有一种。文化翻译现象也是如此。只有把文化翻译事实放到它们实际所在的语境中,才能科学地阐释它们存在的原因。

7 文化翻译学的学科体系

在立足于翻译本体的文化翻译(学)研究中,《文化翻译学》(王秉钦 1995 2007)和《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 1999 2007)是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文化翻译学》一书认为,文化翻译学的结构

体系包含3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与相关学科知识来源研究(王秉钦 1995: 7-8, 2007: 10)。《文化翻译论纲》一书对文化翻译理论的构建基于狭义翻译过程,始于理解(文本微观与宏观的文化解读)终于表达(文化表现)。这两本著作对文化翻译学的学科构架作出积极探索。

从学科体系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文化翻译学的学科体系包含4个分支:元理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文化翻译学元理论主要研究文化翻译学的定义、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任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问题,是对文化翻译学这一学科的论证、审视与总体描述。文化翻译学历史研究主要包括文化翻译理论史与文化翻译影响史。文化翻译学基础理论是文化翻译学的根本,它研究基于双语转换的文化翻译的过程与结果(产品)并对其进行描写与阐释。这是关于文化翻译本体的研究,是文化翻译学的理论部分本身。文化翻译学应用研究是文化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包含文化翻译批评、翻译政策和翻译教学等。

8 结束语

“一门学问的元理论的研究水平体现着、标志着这门学问的成熟程度”(刘永富 2002: 2)。本文探讨文化翻译学元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文化翻译学的定义、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任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本文的探讨只是一孔之见,相信随着文化翻译学的发展,文化翻译学的元理论也必然会更加完善。

注释

①该观点被收入孙迎春主编的《译学大词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并被转录入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页)。

参考文献

贝塔朗菲. 一般系统论: 基础、发展和应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
李德顺. 序[A]. 价值哲学问题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刘永富. 价值哲学的新视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吕红周 单红. 从翻译的重新定位谈翻译符号学[J]. 外语学刊, 2016(5).
吕俊. 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 外国语, 2004(4).
吕俊 侯向群. 范式转换抑或视角转变[J]. 中国翻译, 2010(1).
王秉钦. 文化翻译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王秉钦. 文化翻译学: 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杨春时 邵光远 刘伟民 张纪川. 系统论 信息论 控制论浅说[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7.
张柏然 辛红娟. 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周志培 陈运香. 文化学与翻译[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Chesterman, A. Causes, Translations, Effects [J]. *Target*, 1998(2).
Snell-Hornby, M.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Гарбовский Н. К.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M].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0.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Курс лекций* [M]. М.: ЭТС, 1999.
Кузин Ф. А. *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Методика написания, правила оформления и порядок защиты* [M]. М.: Ось-89, 2008.
Швейцер А. Д. *Перевод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Газет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и воен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 [M].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73.

定稿日期: 2016-12-15

【责任编辑 陈庆斌】